

真正使命



萨比娜·阿尔基尔热衷于 衡量和消除贫困

艾伦·惠特利

发展经济学家很多，但同时还兼任牧师的经济学家却是少数，萨比娜·阿尔基尔(Sabina Alkire)就是其中一位。阿尔基尔是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OPHI)主任，平时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宗教信仰。她的办公室在牛津大学的植物科学大楼，房间虽小但设备齐全，没有梦幻般的宗教顶尖设计，唯一一件宗教标志物就是一个缠着无数绳节的曼陀罗——西藏佛教吉祥物之一。

“跟我交情很深的朋友都说我很着迷于成为一个宗教信徒，”她咯咯的笑道，笑声格外有感染力，就像位邻家小姑娘一样，“我也觉得我和无神论者或者人文主义者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做事儿都是出于热爱。”

但当谈及以其名字命名的多维贫困指数时，很明显她不只是单纯地受到对学术研究的热情的驱使而更好的观察和衡量贫困，以便消除贫困。她说，“我们从事发展服务研究的人，尽管信仰和要遵循的教义都不尽相同，但都坚定地致力于促进人道以及公正。”

详细情况

OPHI 的贫困指数旨在完善传统的贫困基准(1.25 美元/天)，其独特之处在于对贫困人口生活的不同方面都有更为精细的测评。有着美英双重国籍的阿尔基尔说道，“你需要这两个指标，才能全面认识贫困。”

全球化多维贫困指数(以下简称 MPI)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调查，其十个衡量指标涉及三大领域：健康——以营养和儿童死亡率为

衡量标准；教育——以学校教育年数和出勤率为指标；生活标准——以居民用电情况、卫生状况、用水情况、楼层类型、厨房燃料以及基本资产所有权为评估对象。1/3及以上指标不符合标准的家庭则被认定为“多维贫困”。2015年6月所做出的全球化指标覆盖来自101个国家的52亿人口，接近全球总人口的3/4。结果表明，平均而言，约30%的人口属于“多维贫困”。阿尔基尔所在团队将调查结果细分到了884个国家层级以下区域，并提供了一些国家层面的平均值可能没能反映出的信息。阿尔基尔一再强调说，这些都是团队努力的成果。

阿尔基尔希望这一指数能成为数据革命中的一部分，来指导与贫困作斗争。

OPHI发布的MPI的亮点之一在于，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权重和阈值，根据其具体情况制定指数衡量方法。的确，阿尔基尔也说到她的团队现在将大量精力用于研究国家MPI，而非全球指数。因为MPI可按照不同的指标细化分解，政策制定者不仅能通过它了解总贫困率，还能放大贫困对不同的类型人口（如不同区域或不同民族的人口）造成的影响。总之，该指标以家庭为单位，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贫困发生率以及程度，从而使政府制定的政策更具针对性。

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简称UNDP）《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的首席统计学家米洛拉德·科瓦切维奇（Milorad Kovacevic）说：“这两大因素让人们，尤其是政策分析师们，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情况，更好地洞察一个国家的贫困状况及其发展动态。”在2010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中，UNDP用阿尔基尔和玛利亚·艾玛·桑托斯（Maria Emma Santos）在OPHI提出的MPI取代了原来的人类贫困指数。玛利亚·艾玛·桑托斯现在是阿根廷布兰卡港苏尔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助理教授。

因为与OPHI在统计方法方面存在差异，2014年UNDP开始单独计算贫困指数。另外，他们决定并同意于2016年制定出一个单一的MPI。阿尔基尔说，“他们都是相当出色的同事，能再次和他们一起工作将会是段很棒的经历。”

不丹、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菲律宾都已采纳国家官方MPI，并以此为指导分配资源、衡量政策实施力度。其他几个国家（包括突尼斯）也开始加入这一行列。

据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所言，该国将MPI作为2014—2018年国家发展计划的指导方针。6月，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召开的第三届多维贫困对等网络年会上，桑托斯说：“对抗多维贫困更艰难，但也更见效。”该组织是一项南南倡议，包括来自40个国家的官员。

阿尔基尔表示，这一指数一定不能被搁置。她希望它能成为数据革命中的一部分，来指导与贫困作斗争。她还说：“真正让我热血沸腾的是我们能和一群热情专注的人一道工作，他们采用这一衡量指标并将其运用到政策当中。我们当前正处于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阶段。”

如果说MPI好像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作品大有联系，那是因为事实正是如此。正如森2000年在《自由发展观》（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写的一样，贫困“并不仅是收入低下，而是能力被剥夺”。阿尔基尔表示，她视这位印度经济学家为她的导师。的确如此，森曾答应过要当她的博士导师，但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由于时间压力，他不得不退出指导。

她的书架上摆满了森的作品。森2013年在牛津大学的讲座宣传单仍然放在她文件柜的最上层，她办公室外的标语也引自森在“社会选择的可能性”那堂讲座中的一句话：“社会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关注以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用一个指数就衡量出总体贫困程度而不让人怀疑？”这句话诠释了OPHI的使命。

森是OPHI的顾问，阿尔基尔也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她说：“他并没有插手，因为MPI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对此有批评意见，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他给所有想在他的研究上做出进一步改进的人很大的发展空间。他本人并没有尝试主导一切。”

曲折的道路

阿尔基尔在研究MPI之前的经历可谓曲折。她于1969年出生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城，但她在婴儿时期就离开了那里，因为她的父亲接受了一份工作，去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教授化学工程。阿尔基尔在她父亲所在的大学学社会学，1989年毕业后读医学预科班，之后被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录取。但在“空档年”期间，她决定不读这个专业，以避免过重的学费贷款压力。

在空档年期间，她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当了三个月的志愿者，为那些从巴基斯坦巴沙瓦逃出的阿富汗难民注射疫苗。她回忆道，“我住在当地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有个儿子，在我的大学读书，他的姐妹们和我同龄。我很快就熟悉了他们的文化、掌握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很爱伊斯兰教。”在印度那几个星期，她在加尔各答市莫特·特蕾莎照顾奄奄一息的病人、拜访喜马拉雅邦的藏民居住点、在南部斯里兰卡难民营工作。“我尽可能地学习更多的东西，就像一般学生空档年一样。”之后，阿尔基尔决定深入学习神学。“我不知道神学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好像是个奇怪的选择，”她友善地说，“我有很深的信仰，至今仍有——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想了解上帝，而且我知道这并非神学的内容。神学好像更多的是学习课本上那些与上帝有关的课文。”

阿尔基尔于1992年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完成神学学业。她说自己差点就无法毕业：“说实话，在教义方面，我险些不合格。我根本没有理解罪恶和苦难之间的差异。”然而，她的伊斯兰论文却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或许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课程，而且我一直在学习阿拉伯语的《古兰经》，所以我能对阿拉伯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之后，阿尔基尔继续攻读基督政治伦理学哲学硕士，试图探索出更多实用的途径，在尊重他人文化和精神价值观的前提下研究人类发展。她用外交的口吻说道，那不是牛津神学部“在天堂的一场比赛”。她1994年的硕士论文题为《自1990年以来世界银行消除贫困概念：理论分析》，因内容过于现代而未得到学院的认可，因此学院拒绝了她的博士研究项目。她再一次做出转变，在罗斯玛丽·索普 (Rosemary Thorp) 的敦促下选择了经济学。罗斯玛丽·索普是拉丁美洲经济学的一位讲师。阿尔基尔将她形容为“完美女性”。她说能进步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她一直在听计量经济学课，并研究发展理论，她发现这些课程都十分“简单并且有趣”，而且那时她就已经在钻研森的作品。至1995年，她已获得硕士学位，紧接着在1999年取得博士学位，两段时期都在用森的方法研究人类发展。

1999年到2001年间，阿尔基尔在世界银行任职，负责神职培训。期间她认识了当时牛津主教的专职教士爱德蒙·纽厄尔 (Edmund Newell)。阿尔基尔是从神学转向经济学的，而纽厄尔在成为英格兰教教士之前在牛津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二人合著了一本书名为《一个人能成就什么？治愈破碎的世界的信仰》(What Can One Person Do? Faith to Heal a Broken World)，此书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纽厄尔说，“她对经济学就像对基督教一样充满职业感。她完全投入这项事业，看重幕后的研究团队。这是我和她一起工作以来感受最强烈的一点。”纽厄尔现于伦敦市外主管一个教育慈善机构和研究中心。

他补充道：“这并不是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世界贫困人口的方法。这一直是指引我们工作和前进的光芒，也是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中的亮点。”

阿尔基尔曾想过将森的能力测量方法用来估量多维贫困程度，在2006年这一想法终于得以突破。那时，她开始和詹姆斯·福斯特 (James Foster) 合作。福斯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也是测量方法学方面的领军人物。还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福斯特于1984年和乔尔·格里尔 (Joel Greer) 及艾瑞克·托尔贝克 (Erik Thorbecke，他俩也是康奈尔大学学生) 一道发明了以三人名字缩写命名的贫困测量指数，至今该指数仍广泛用于



阿尔基尔的肖像，由已故画家卡尔·拉扎里 (Carl Lazzari) 于2006年所画；详情参见“拉撒路的复活”。

测量一些单一变量，如收入、消费以及卡路里摄入量。那时，阿尔基尔正在组建 OPHI。她说，一开始福斯特“对每个多维的事物都很没有把握”。她回忆道，“但是我们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身实践这一方法，然后我们恍然大悟，在他的工作基础上，发现了方法论方面新的可能性。”

阿尔基尔-福斯特方法为 MPI 提供了支撑，该方法是在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头脑风暴之后才获得的。阿尔基尔说她从福斯特身上学到很多。她说：“在理论研究方面，他的方向更为明确。他能获得足够的研究证据，他说这就像是一种我能理解但没法表达的语言。”她又笑起来，说道：“我在努力学习更多，但他总是在我之上。”

严厉的批评家

阿尔基尔表示，学会沉思能舒缓她儿童时养成的“暴躁的性情”。当然，她沉稳的性格必定也与2010年那件事有关。那时她在不丹，在一次禅修的时候，她被告知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研究员的马丁·拉瓦里安 (Martin Ravallion) 对 MPI 非常感兴趣。她回忆道，“他们打电话给我，让我走三英里路到酒店，连上网络，速速联系马丁。”

谈到 UNDP 新 MPI 的目的时，拉瓦里安指出，要用一个单一指数就反映出贫困的方方面面，这很难让人信服。他写道：“我们都认同降低儿童死亡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目标，但是没人能说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就等于消除了贫困，就等于不用再住在脏地板上、不用烧柴做饭，就等于有电视、广播、电话、自行车或轿车。”

五年之后的现在，拉瓦里安已经是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他仍然是位苛刻的批评家。在他看来，将衡量贫困的不同方法用一个单一指数来表示就像是将一辆车的所有刻度盘和测量器做成一个工具一样。“社会福利中的人类发展维度对衡量社会进步都至关重要，但是我并不想将福利和物质混为一谈。我想对它们进行单独的研究，想了解国家在哪些方面表现良好以及在哪些方面表现欠佳。”在拉瓦里安看来，如果政策制定者不了解指标各要素之间的权衡，将不同指标合并为 MPI 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他还指出，“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使用这一指数。政府部门审视这些指数时，他们并不清楚该指数的构成要素。我认为，该指数不能帮助制定出良好的政策。”

政策分析家比经济学家更偏爱 OPHI 的 MPI 等多维指数，这还只是个保守的说法。除了在选择组成元素和其权重方面存在主观性以外，该指数还遭到其他方面的批评，如该指数是基于国际调查数据和指标而获得的，这些指标并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例如，用衡量前苏联的方法

衡量非洲贫困状况，这恰当吗？MPI使用序数词而非基数词，对此统计学家们也嗤之以鼻。“这些复合指数的目的是交流，不能误认为它们是精确值，”UNDP的科瓦塞维奇(Kovacevic)说，“但如果人们好奇并且想弄清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某件事情的发展方向不同，那他们就可以分解这一指数，了解指数中的不同构成要素。”

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认同阿尔基尔的看法，指出如果只从收入的角度来对抗贫困，所得的结果将极具误导性。肯尼说，像海地和刚果共和国这类国家，儿童死亡率有所降低，教育状况也得到小幅改善，但是收入仍然迟滞不涨。肯尼是《渐入佳境：全球发展成效初现，努力将世界变得更美好》(Getting Better: Why Global Development Is Succeeding—and How We Can Improve the World Even More)一书的作者。MPI可能会取代简明方便的传统衡量标准，即笼统地以每天1.25美元收入为贫困分界线。对于这一点，肯尼也有所怀疑。他说：“我思考的是，人们强调贫困是多方面的，但是衡量贫困的MPI却只是个单一数字。”

另一个问题就是，只有搜集的数据良好，所得的指数才好。但在新兴经济体市场，数据质量总是不行。“发展中存在两方面的知识问题：缺少对贫穷国家的认识，不了解贫穷国家中生活更贫苦的人，”《为什么经济学家错误理解了非洲》(Africa: Why Economists Get It Wrong)一书的作者莫顿·杰尔文(Morten Jerven)如此说道。例如，对每户人家是否真的能有效使用电(MPI的指标之一)方面进行的当地调查并不充分。“MPI的确有剖析一些复杂情况，也确实比其他的测量方法更出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州本拿比西蒙弗雷泽大学副教授杰尔文说道，“但如果数据没有及时更新或者不是在切实观察的基础上获得的，这些研究可能会毫无意义。”

在追求更精确的贫困衡量方法的研究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怀疑传统的统计方法(尤其是GDP)是否能有效测量数字经济中的经济增长，更不用说衡量人民福祉、社会福利以及环境可持续性了。

“为了精确地衡量出在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我们认识到除GDP这一衡量指标外，还需要其他指标，”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议会国务秘书古德伦·柯普(Gudrun Kopp)在解释为什么柏林开始支持OPHI在衡量多维贫困的工作时，如此说道。

《GDP：一段简短而深情的历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的作者戴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提倡使用一系列指标，以此追踪影响社会福利指标的变化，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统计的美好生活指标(Better Life Index)。“有人提出反驳的观点，即你需要一个数字，因为这是投票人和政治家们关注的东西，”科伊尔说，“尽管这一驳论很有力度，但这同时也表明每个政策都有需要妥协的地方。”阿尔基尔看到了这种系列指标的好处，但她还

是提议MPI应该被纳入其中。她表示，“分析贫困状况时，应该只对福利被剥夺情况进行逐个分析，而不用分析被剥夺多项福利的人群。对于这一点，我们无法认同。”

值得称赞的是，OPHI的网页提供批评MPI的论文和博客链接。阿尔基尔说：“我们的工作仍然遇到很多阻力，目前尚未成功。”OPHI团队一直充满热情地研究并改善指标，她补充道，“任何事都会受到批评议论，当然我对于自己的这套研究方法和指数同样是批判对待。”并非所有数据都具有可比性，有的也不是最新数据，有的国家层级以下的地方调查也可能有漏洞。但MPI指数相当不错，并随着调查质量的提升而迅速得到完善。她坚定地说：“对于公众的批评意见，尽管从实际角度来看我并不赞同，但是我非常理解也很尊重这些意见。”

待办事项

所以，阿尔基尔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呢？她已经决定要继续完善MPI，并将其运用范围扩大到衡量就业、赋权(“我的热爱”)和暴力的维度。她想让这一指标更好地反映女性的生活情况及其待遇，但是这样的计划还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支持。“你的行为不能太过超前于国家”阿尔基尔说，“这是国际社会要做的决定。如果他们想要一个适应不同性别的指数，我们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拿不到数据。”

有人认为衡量多维贫困需要收集更多数据，而不是统计收入或者消费贫困，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人口和健康调查是OPHI项目的主要资源来源(另外一个来源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多指标类集调查》)，在其调查提供的625个问题中，MPI只采用了其中的39个问题。只要对问题做一点调整就足够了。她说：“只要花几秒钟的时间就能获得更好的信息。”

阿尔基尔将在2016年9月开始指导美国的项目。在美国，她和詹姆斯·福斯特一道，接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全职教授一职。她说：“乔治华盛顿大学提供了一个温和的环境，以实现良好的过渡。”然而，衡量贫困标准的调研仍将以不同的形式在牛津继续进行。“我们不清楚这些研究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新发现，”阿尔基尔说，“我只是想继续研究我自己的这个项目。”

同时，她要处理的其他事情也很多。礼拜使她远离了烹饪、锻炼和冥想的爱好。除了履行她在莫德林学院荣誉牧师的职务以外，她还投身于东牛津考利·圣约翰教区的事务。东牛津已多年没有一位教堂牧师了。“虽然只有一年，但显然这一年改变了我的生活。很多个周末我都是呆在家里。感觉很奇怪。”她笑着说。上帝的工作似乎永远都做不完。■

艾伦·惠特利(Alan Wheatley)是经济学家兼编辑，之前就职于路透社，是《货币的力量》(The Power of Currencies)一书的编辑和合著者。